

白雲文史

第八輯

廣州市白雲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白云文史

第八辑

广州市白云区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3年4月

主 编: 周树华

责任编辑: 梁钜麟 梁伯彦

封面设计: 何捷忠

题 字: 王永华

王永华

目 录

- 白云水利古今谈 亮 参 (1)
互助合作在穗郊 苏展炽 (7)
二十年代禺北的公路建设 蔡 碧 (13)
广花公路筹建经过 球 深 (16)
广花公路的历史与现状 哲 夫 (19)
陈济棠兴建西村土厂始末 罗冠群 (22)
冯锐与广东蔗糖业 草益敬 (25)

- 建国后广州市郊区沿革综述 张衍森 (30)
水上居民源流史略 西 祖 (39)
白云地区水上居民上岸定居记 梁 群 (43)

乔梓联芳

- 记商衍璽父子的生平事迹 区定祺 胡 平 (47)
一座鲜为人知的状元墓 陈魏忠 (54)
三元里小学简史 罗惠琼 黄志强 王宝芹 (58)
流溪乐社小记 戴桂波 (62)

- 刘耀柱伉俪嘉惠桑梓 周群航 梁伯彦 (68)
发家不忘本 为善不后人

- 记旅港乡亲凌礼康 王坚辉 (71)

加拿大爱国侨领茹容均.....远航(74)
新西兰太平绅士谢桂亮.....辛夷(77)

群众来信

同做文物“保护神”

——致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艾 苑(80)

编后记

白云水利古今谈

亮 参

水为农业之命脉。每遇天旱，乡村争水而打斗之事常有发生。古之有刑字，皆因水利纠纷而创，固刑字在井旁加一把刀，意为因争水而发生殴斗者必将绳之以法，判之以刑。

近日白云区修地方志，太和镇志办就发现一石碑，记下石湖、南村因天旱争水而发生械斗，世代成仇之事，阅后真有“闻者伤心，见者流泪”之感。碑曰《九善堂碑》，文中有云：

“番禺慕德里司属大元（源）洞山泉，流注茶山之麓，久为石湖、南村两乡灌溉所需，向皆相安。自百年前，偶因天时亢旱，各有争竞，遂致兴讼酿斗，历由官判失当，贻为厉阶，祸悬未已者诚有故也。逮民国光复其斗尤烈，甚至互诱军队，滥加焚杀，波及乡邻，其祸更惨，死者千数，焚亦千百家，死（尸）横于野，生者失所。我九堂院同人，闻之不忍……”

南村、石湖建村之初，两村和睦相处，世代友好。向皆相安无事。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因农业发展，农田扩大，用水量多，两村商议于百足桥筑陂引大源洞山水灌田。筑陂后，双方得益，相安无事。直至清朝嘉庆末年（约1820年），因天旱缺水而发生水利纠纷，“致兴讼酿斗”，又因“官判失当，祸悬未已”，民国以后，“其斗尤

烈”。至民国九年（1920年），经九善堂调解，筑成南、石陂，使陂水合理分流，订立协约，共同遵守，两村才言归于好。但因水利问题未有根本解决，每逢天旱，争水纠纷之事常有发生，两村村民心存芥蒂。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彻底解决。

白云区解放前水利失修，广花公路一带（人和、蚌湖、江高等地）农田用水，其水源均以地下水为主；广从公路一带（太和、竹料、钟落潭、九佛、罗岗等地）则以山泉为主。流溪河横贯其中，但因无水利设施，滔滔江水，一任东流，无法利用，水旱频繁，三日不雨，则旱象环生，全家大小出动抗旱，日以继夜战斗在田头井边；因无截流蓄水设施，每遇小雨，即洪水泛滥成灾，农田受淹，故有：“街口（从化街口，在流溪河上游）洒湿石，人和（在流溪河下游）涨三尺”的谚语。由于水利失修，粮食产量极低，原禺北地区水稻年平均亩产一般只有四百斤左右。鉴于解放前水利失修，农业凋零，民不聊生之局面，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兴修水利，经四十余年努力，白云区水利灌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解放之初，1951年冬春，番禺县六、七、八区，现白云区的石井、蚌湖、江高等地区，普遍兴修水利，新筑成了南马窿、蚌石、小朗等堤围山塘。1952年9月，在广州“工赈队”（当时，广州有大批失业居民，政府把他们组织起来，以工代赈，简称“工赈队”）的支援下，筑成了黄金大围，使石井地区三万多亩农田解除了洪患，扩大了耕地面积，部分耕地由单造改为双造。在此同时，又陆续建成了一些小型山塘水库，如大金钟（新市）、南塘（钟落潭梅田）、李坑山

塘（龙归永兴）等山塘水库。其中李坑山塘集雨面积0.34平方公里，最大坝高18米，坝长100米，由当时的番禺县列入1951年度计划，并组织施工，由省农林厅水电局派出技术人员协助；南塘窿山塘集雨面积1.07平方公里，最大坝高12米，坝长134米，同时列入1951年计划，由当地区乡自筹自办，1957年扩大为小型水库。这些堤围及山塘水库都是白云区最早建成的水利工程。

50年代中期，农民参加了互助组合作社，对修好水利，发展集体生产有很大的积极性。当时，白云区（原禺北、禺东地区）又连年遭受水旱灾害，广东省、番禺县都把这一地区列为水利建设的重点地区。在这个时期建成了一批库容一百万立方米以上、技术要求较高的水库，如沙田、铜罗湾、新陂、白汾、梅窿、红路、磨刀坑等水库，都是在这时候建成的。在此同时，还建成了万亩以上的岭南围和龙岗、竹料、湴湖、莞岗、八岑、解放东、解放西、沙凤、横沙等堤围。又建成了三元里、萧岗、夏茅、大朗、神山、江高、车公庙、沙岗岭等大型抽水机站，改建了一大批比较大的水陂，办了几十座小水电站。

1958年公社化、大跃进时期，人民群众意气风发，在“大办水利”、“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口号鼓舞下，建成了流溪河引水工程（1958年7月动工，1959年竣工）。该工程跨越两县一区，渠首拦河坝建于从化县大坳，拦截流溪河干流，坝长237.5米，引水流量每秒33立方米；左右干渠渠首各建进水闸一座，渠长157.7公里（白云区段内86公里）；支渠96条，共长277.8公里（白云区段内支渠29条，共长144公里），设计灌溉面积41万亩，15个公社受益，其中白云区

灌溉面积21万亩，8个公社（现1街11个镇）受益。

1963年，珠江三角洲电动排灌网广州郊区第一至四期电动排灌工程相继完成，几百座大大小小的电动排灌站遍布全区，高低压电网架设到全区农村的各个角落。至此，全区已形成了一个引、蓄、提相结合，排、灌、防俱备的比较完善的水利体系。

1966——1976年文革期间，白云区水利建设曾经一度停顿，但农民群众排除干扰，水利建设很快又有新的发展。在这期间，全面平整了土地，整治了排灌系统，完成了一批新的水利工程项目，如李溪、人和拦河坝引水工程、黄龙带水库（市主管，郊区、花县合办）、和龙水库、鹿颈坑抽水机站、木疆引渠、大田排洪河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城市不断扩大，菜区向中远郊转移，经济建设用水增加，对水利的要求更高。我区水利建设的重点是：对原有水利工程加强管理，堤围加高培厚扩阔，建设新菜区治涝排灌工程，引进新的技术设备，提高水利工程为农业生产、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效益。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例如，国家投资1500万元，整治流溪河灌溉工程，现已完成主干渠15.7公里及其系统灌渠85公里的硬底化工程；鹤冈围、黄金围、新市围、岭南围均已按目标加高培厚扩阔，黄金围有35公里、鹤冈围有7公里分别可通汽车。到1990年止，白云区共建成了大小水利工程1575宗，全区耕地面积316394亩，有效灌溉面积占98%以上，保证灌溉面积占95%以上，旱涝保收面积占80%以上。

白云区人民经过四十余年的艰苦奋斗，辛勤劳动，大力

兴修水利，整治田园，水利建设不断发展，抗灾能力不断提高，为农业的稳产高产提供了良好的水利条件。农业连年丰收，水稻年亩产由解放初期的414市斤（1950年）提高到1412市斤（1991年），增长了2.4倍，蔬菜及其它经济作物也获得大幅度增长。

附：九善堂碑

番禺慕德里司属大元洞山泉，流注茶山之麓，久为石湖、南村两乡灌溉所需，向皆相安。自百年前偶因天时亢旱，各有争竞，遂致兴讼酿斗。历由官判失当，贻为厉阶，祸悬未已者诚有故也。逮民国光复，其斗尤烈，甚而互诱军队，滥加焚杀，波及乡邻，其祸更惨；死者千数，焚亦千百家；死横于野，生者失所。我九堂院同人，闻之不忍，亟筹巨款，分别赈恤。旋为劝处，词犹各执，久仍未决；舌敝唇焦，仅暂寝息。今幸两乡悔祸，石湖乡谢国奎、谢寿山、谢廷瑞、谢烈修，南村乡周镜宇、周伯夔、周会平、周健光等，延同知证龙眼洞樊芳甫、萧冈谢添思、夏茅刘天衡等，具词分析，均愿立约联和候处。同人等嘉其觉悟，先后会同番禺县萧王两知事，集同两乡人众，并延中外工程师，详加测勘，按其地势，原分两圳，各有高低，流有强弱，非从根本解决，难垂永久。应将上游两圳合为总圳，筑分水塘于新桥之上。塘广四十尺。水注塘中，即于塘下分开两决口，各阔五尺，左注石湖圳，右注南村圳，蜿蜒而下。石湖之水仍由交加圳石槽上过，南村之水照旧于石槽下过；此属众愿以

留古迹也。分水圳之高者低之，低者培之，庶昭其平，流无强弱。另梅陇之麓筑蓄水塘，广十九亩有奇，遇旱开闸放水，灌溉自可敷足。分水塘右建亭，颜曰“南湖亭”，为九堂院所派两乡看陂人役住室，兼以施茶，统由九堂院经管其费，即由石湖乡所送九堂院榄园，南村乡所送九堂院田亩租项开支。分水塘之上下，两乡各不能另筑新陂及毁陂改挖夺流情事。迭经两乡联约缴呈备案，全始全终，两不侵占。兹当工竣，同人等躬预其事，用缀数言，俾同遵守，永敦睦谊，言归于好，有厚望焉。爰是为记。

爱育善堂 广济医院 广仁善堂
惠行医院 崇正善堂 明善堂
方便医院 述善堂 润身善社 公志

中华民国庚申年十二月谷旦

附说：1. 原碑文全部是繁体字，无标点，现改为规范字，并加标点。

2. 1990年11月太和镇志办抄录于原石碑。

(注)：厉阶：祸端。厉，恶也。阶，所由上下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妇有长舌，维厉之阶”，均见之于《诗经、大雅》。

互助合作在穗郊

苏展炽

大家齐力剗孱颜，耳听田歌手莫闲；
各愿种成千百索，豆萁禾穗满青山。

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
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

宋初王禹偁所写的上述这两首畲田调，描写了当时（宋代）山区农民互助合作勤力耕种情景。第一首诗的意思是：大家齐心合力在山上的峰岩（孱颜）间隙砍杂草锄耕地，一边唱酬着山歌，一边挥动着锄头砍刀，没有半点儿空闲；大伙都想开垦出十来亩土地（一索等于十丈、一亩等于六十六丈、千百索大约是十多亩地）。到了秋天，看那些黄豆绿豆、金色的玉米红色的高粱穗（禾穗）盖满整个大青山。第二首的意思是：趁着大好春光，在北山种上了庄稼，又到南山播种，大家互相合作，努力耕种，那有半点偏心，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如果这个社会所有的人都象我们一样，那么，山河处处就应该不会有被丢荒的土地了！“愿得人间皆似我”，这个“我”字，既是指农民，也是指诗人自己，是诗人自己的自我写照。“也应四海少荒田”，诗人发出深沉的感慨，含义深刻，在这一句里，诗人既是对封建社会的批

判，又是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从上述两首诗反映出来的情景看，在我国农村共劳共享，互助合作的思想是有深远基础的。

广州市白云地区土改结束后（近郊1951年，远郊1953年），农民从封建土地所有制枷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分得了土地的农民，都以巨大的热情投入生产，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以近郊为例：土改前1950年水稻亩产480斤，土改后1951年增加到566斤，52年634斤，53年676斤；蔬菜土改前亩产不足7000斤，土改后1952年增至7802斤，53年增至8088斤。农业总产值1953年比1950年增长了65.7%。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农民生活的改善，许多翻身农民建了新屋，穿上新衣服，吃上白米饭，解决了温饱问题，结束了土改前的凄凉岁月。

但是，由于土改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必然导致农村两极分化。一部分农民由于资金、劳力不足，天灾人祸，无节制地生育等原因，生活又迅速陷入贫困，靠出卖土地过日子，他们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又迅速丧失了土地。而另一部分农民，由于劳动力强，有余钱剩米，赚了钱就在本村向生活困难要出让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出现了新的土地兼并现象。据资料记载，近郊杨箕村有3户农民已演变成资本家，有部分农民已重新沦为打工仔，靠打散工维持生活。

为了使广大农民不走老路，不吃“二茬苦”，土改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根据当时广大农民既有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巨大热情，又在发展生产中存在诸如资金不足，劳力不足，畜力不足，农具缺乏等实际困难，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组织起来，发展

生产”的号召，

党的号召一经发出，郊区各地农民就立即行动起来，响应号召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因为党的号召就是农民的心声，互助组很快就在郊区各地有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当时最有名的互助组是杨箕的姚浩鹏、棠溪的梁顺财、沥滘的陈柏有、三滘的陈德光等互助组。互助组组织起来后，立即掀起了爱国丰产竞赛，组与组之间展开了挑战。当时梁顺财互助组订出了生产计划向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农业生产合作社应战，向本市郊区的互助组和农民挑战。在他们的推动下，全郊区许多互助组纷纷起来挑战应战，还带动了600多户农民起来参加竞赛，丰产竞赛搞得热火朝天。通过丰产竞赛，涌现了许多模范互助组和丰产模范，陈柏有和梁顺财等互助组连续获得市、区丰产模范组的光荣称号，又带动了一批农民参加了互助组。

互助组发展起来后，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这些优越性是：一。农具互通有无，解决了组员生产上的困难。陈德光互助组四户组员，没一户有完整一套农具，有的有禾桶没有禾围，有的有晒场没禾桶，不是缺犁就是缺耙。西村的李德祥互助组组员李树国，土改分得五亩多田，但只有三只谷箩，如果不参加互助组，就无法开耕。农民参加互助组后，耕牛农具互通有无，生产上的困难就基本解决了。

二。生活上互相照顾，帮助困难户渡过春荒，医好病痛。梁顺财互助组组员梁金和，口粮不足，梁顺财和组员很关心他们一家，主动借粮借钱给他渡过了春荒。春耕后，他的妻子小产，自己脚痛，组员把他们送到广州市内医院医治。他感激地说“如果不是互助组，我早就没有妻子了！”

三。互助组能帮助组员做好农事安排，不误农时，节省时间，节省劳动力。互助组的生产问题一般都由组员集体讨论，组长根据大家意见，统一安排农事活动，合理使用劳动力、畜力，因此，能节省工时，提高工效。梁顺财互助组第一年缺乏组织经验，还要雇请140多个外工来组帮助，第二年有了经验，对农事、劳力巧作安排，就不但不需雇工，还帮助组外耕多了二亩四分地，积了二百多担猪粪肥，帮助烈军属和孤寡老人做了一些工。陈德光互助组的周应和、郭有入组前要雇30多个工，入组后不但不欠工，还有时间到农场做工，多赚了四担谷。

四。互助组确实能增加生产改善生活。梁顺财互助组的水稻产量，一般比当地农民多出17%；陈德光互助组水稻亩产比上一年增长16.8%，其他互助组也都获得了增产。生产搞好了，生活也改善了，缺口粮的不再缺了。梁顺财互助组过去七个人吃三碗晏（三碗午饭），吃辣椒、萝卜干做菜。那年秋收后，大家能吃饱饭了，而且还能吃上猪肉芋头做菜，未入组的农民都很羡慕他们。

五。互助组能使组员提高文化，增进家庭和睦，提高政治地位。互助组不但在生产上互助，在生活上也互相帮助。互助组经常组织组员学政治时事，到夜校学文化，在组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组员思想进步很快，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梁顺财互助组的梁细珠，因大食懒，没钱拿回家，经常打骂母亲，通过在组内学政治，学文化，在大家的耐心教育、批评督促下，改变了好吃懒做的作风，懂得勤俭持家，以后就很少和母亲吵架，一家团聚了。陈德光互助组在土改复查时有四个人当了代表，陈德光当了农代会主席团成员。

互助组的优越性很多，参加互助组还可以得到政府农业基金和各种贷款的支持，生产资料的优先供应等等，因此，对农民的吸引力很大，互助组发展得很快。到1953年3月，近郊各地已有常年互助组151个，临时互助组576个，参加农户共3059户，占农户总数的14.5%。

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后，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加快了步伐。1954春耕前，郊区已经建成了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办社试点。这批试点社有：兴华、石牌、三元里、肖岗、棠下、宦溪、双沙、黄村、鹤洞、西塱、磨碟沙，还有当时仍属番禺的良田、南岗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批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办成，为郊区农民树立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样板，标志着郊区互助合作运动进入了新阶段。试点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办了不到一年，其他地方的农民就自发地纷纷要求办社，1955年，郊区各地进入了互助合作高潮，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回顾农业互助合作所走过的道路，使我深深体会到，我国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是有热情、有基础的。我亲身参与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当时农民在互助组或在初级农业合作社劳动的情景，就象本文开头诗歌描写的一样，人们在田里劳动热情很高，“耳听田歌手莫闲”，“相助力耕岂有偏”，不会斤斤计较谁多干一点，谁少做一分。但是，随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很快又转为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超越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吃“大锅饭”，人的积极性受到限制，后来虽然经过贯彻农村工作《六十条》，但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还是比较慢，有些地方长期摆脱不了贫困的局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双层经营，有统有分，既发挥集体的优越性，又发挥了个人的积极性。农业互助合作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从此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创造。的确这是我国农民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它适应了我国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又符合我国农民走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当然，在其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索，但是，它将会得到健康发展，这一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我国历代农民都追求实现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从春秋战国时孔子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天下为公”的社会；《礼运》一书描绘的，我们在人民公社化时广泛宣传的“老有所安，少有所教，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晋代陶渊明描绘的无压迫、无剥削、无苛政的桃花源；太平天国洪秀全提出的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社会，以至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耕者有其田”，都反映出农民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如果说，这些愿望和理想都近乎“乌托邦”的话，那末，我们今天农村所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我们广大农民所追求达到理想愿望的必由之路。我们正在沿着一条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